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方志的名称

中国方志有一个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记述的内容、形式、名称是不尽相同的。方志名称的演变，反映着方志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

在方志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其名称有的因受当时史书名目变化的影响，把一些志书的名称叫做“记”、“书”、“史”、“典”、“考”、“鉴”、“览”等，有的则随志书的内容偏重某一方面而得名。偏重地理的以“地理”、“沿革”、“指南”等为名，偏重掌故的常名为“掌故”、“典”、“故”等，偏重文征的则以“备征志”、“足征录”、“文献备考”等取名。尚未定稿的方志，通常以“志稿”、“未定稿”相称。同一地域内多次修志的，往往以“新”、“旧”、“前”、“后”、“续”、“补”、“重修”、“新纂”等加以区别。还有随历代建置的变迁，同一地方在历史上几易名称，其志名也就随之而别。如苏州有吴、吴地、吴州、吴郡、苏州、平

江等不同称谓 还有姑苏、吴门、吴中等别名 因此 苏州的方志 也就有《吴地记》、《苏州图经》、《吴郡志》、《姑苏志》等多种不同的名称。也曾有一些志书的编修者，为了表现其崇高典雅 将其志书故意用地方的旧名或别名相称。如《齐乘》 实际上是山东志 卢镇的《琴川志》则是《常熟志》 汪中的《广陵通典》又是《扬州志》 等等。类别繁多 形形色色 难以尽述。但大多是名异而实同。进入近现代以后，一般都通称为志，只是据所记述的地域范围、专业范围及其内容而确定名称。

综合历代方志名称，大致有如下几类：

图、图经、图志、图记、图说、图考类

方志在魏、晋、南北朝时通称为图经。如北汉《河东水利图经》、唐《沙州图经》、《并州总管内诸州图》、《泽州图记》、《河东略图经》、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 3 卷、宋张津《四明图经》 12 卷、宋董弅《严州图经》 8 卷、明永乐十五年以前纂修的《山西五州图》 1 册、《汾州图志》 2 册、《泽州图志》 2 册、明永乐至正统年间纂修的《太原府图志》、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40 卷、元郭荐《昌国州图志》 7 卷、清刘统勋光绪年间《皇舆西域图志》 48 卷、清刘文彻光绪年间《海县厅图志》 20 卷、清海沛翹光绪年间《西藏图考》 8 卷 还有陈明渊《练川图记》、清陆保善《望都县乡土图说》等。

志、志略、小志、志余、志遗、备志、补志类

汉魏有陈述《益州志》、吴韦《三吴郡国志》。现存最早以志为名的是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唐李泰《括地志》 8 卷、清吴玉树《宝前两溪志略》 12 卷、清顾镇《支溪小志》、清庄毓鋮光绪年间《武阳志余》 12 卷、清吴玉搢《山西志遗》 4 卷（抄本）明董斯张《吴兴备志》 32 卷、清周绍濂嘉庆年间《德清县续志》

10 卷清钱泳《锡山补志》1 卷等。

记、录类

“记”、“录”与志含义基本相同。如北魏的《三晋记》、北齐（赵记）、后赵《上党记》、《上党国记》、隋《代都略记》、晋王隐（王隐晋书地道记）、《太原事迹记》、唐陆广微《吴地记》、宋《河东记》、明沈谦《临平记》4 卷、清阚凤楼光绪年间《新疆大记》6 卷、光绪年间《回疆风土记》1 卷、宋史安之《剡录》10 卷、清黄印光绪年间《锡金识小录》12 卷、清陈廷桂同治年间《历阳典录》34 卷、徐天璋民国《泰州征献录》（抄本）、郭克兴民国《黑龙江乡土录》等。

纪略、述略、要略、识略、辑要

这些名称均有简、要、略的内涵。如清杨宾《柳边纪略》5 卷、清徐宗亮光绪年间《黑龙江述略》6 卷、清祁韵士《西陲要略》4 卷、清徐松原道光年间《新疆识略》12 卷、清王志沂道光年间《陕西志辑要》6 卷等。

旧闻、故、掌故、通览类

如民国魏兰民《龙城旧闻》4 卷、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17 卷、清彭遵泗光绪年间《蜀故》27 卷、清傅榘光绪年间《成都通览》等。

乘、考、系、表、鉴类

如元于钦《齐乘》6 卷、明王齐《雄乘》2 卷、明贵养性《历乘》（今济南）12 卷、清侯宗海光绪年间《江浦埠乘》40 卷、清周有壬《锡金考乘》14 卷、钟镛民国《西疆备乘》3 卷、清七十一（椿园）光绪《新疆舆图风土考》5 卷、清师范嘉庆《滇系》40 卷、清七十一（椿园）《军台道里表》1 卷、卓宏谋民国《蒙古鉴》7 卷等。

第二节 方志的种类

中国方志种类很多。科学地区分方志类型，无论是对于正确认识方志的性质、意义和内容，还是对发展方志科学都是十分必要的。

方志学界关于方志类型的划分有多种方法。有按纪年区分的，也有按文体、体例区分的，还有按繁简区分的，而按地域范围区分的为多。按地域范围区分者，一般有以下种类：

一统志或区域志、总志

记事范围包括全国内容者曰一统志，记事范围包括大行政区域者曰区域志，记事范围在两省以上者曰总志。如元、明、清三代均有《一统志》。清和坤等修《大清一统志》500卷、隋虞茂修《隋区域图志》、唐李泰修《括地志》、宋乐史修《太平寰宇记》、明徐学谟修《湖广总志》98卷（湖广包括湖南、湖北）

通志

记事范围限于一省者曰通志。如《畿辅通志》、《山东通志》、《广西通志》、《山西通志》、《湖北通志》。但也有的通志超出了一省范围。例如两江总督监修的《江南通志》，其记载范围就包括了安徽、江苏两省。实际上属总志或区域志的范畴。

府志

记事范围限于一府者曰府志。宋代一府之志，往往不直称府志。例如《建安志》即是建宁府之志，《临漳志》即是漳州府之志。到了明、清两代就直称府志了。如正德《大同府志》、乾隆《太原府志》等。

州 志

记事范围限于一州者曰州志。如《沁州志》、《辽州志》、《潞州志》、《汾州图志》。明清时期州的建制比较复杂，有的州领县，有的州不领县，有的州直隶于省，有的州隶属于府。清代又分直隶州与普通州，直隶州与府平级。通常直隶州之志，直接标明“直隶”二字，如《直隶绛州志》、光绪《通州直隶州志》等等。

厅 志

记事范围限于一厅者曰厅志。如《雷波厅志》、《拉萨厅志》、《江北厅志》、《澎湖厅志》、余修凤等修《定远厅志》26卷（光绪五年刊本）等。

合 志

记事范围在两县或两县以上者曰合志。如《武进阳湖县合志》、《常熟昭文合志》、《昆新合志》、萧鱼会等修《石罔广福合志》4卷（嘉庆十二年刊本）等。

县 志

记事范围限于一县者曰县志。如《壶关县志》、《潞城县志》、《沁源县志》、耿步蟾编修的《灵石县志》、杨拔田编修的《闻喜县志》、清康熙三十二年《平顺县志》（手抄本）等。县志占我国现存方志的大多数。

乡镇志

记事范围限于一乡一镇者曰乡镇志。如《南翔镇志》、《杏花村志》、《双林镇志》、《法华乡志》、《平顺乡志附录》等。宋代常棠《澉水志》是较早的乡镇志。明清以后乡镇志的编写日益增多。

乡土志

记事范围往往以州县为限，侧重地方经济情况者曰乡土志。如《双山县乡土志》、《宜川乡土志》、《辽中县乡土志》、《康平县乡土志》等。

都邑志

记事范围限于城市者曰都邑志。如《长安志》、《新安志》、《天津市概要》、《杭州市概要》、《杭州市新志稿》、《长治市志》、叶楚食、柳诒征主编的《首都志》16卷等。

边关志

记载边关、卫所等情况的志书为边关志（包括关志、卫志、兵备志等）。明代在军事要地设关和卫，清朝在地方设兵备道有《兵备志》等。

此外 还有山水志（包括山志、水志、山水合志等）、名胜志（记载形胜、古迹、寺、观、庵、庙等有关风物之事）、岛屿志（记载河、湖、海洋中的岛屿的情况）、巷里志（唐代无为子撰《北里志》，专记长安城内平康里之事，这当是巷里志之始。明代吕兆祥撰《陋巷志》专门记载曲阜孔庙东北颜回旧日之居处），其它诸如墓志、书院志、地名志、游览志等等都是按记述的范围命名的。

按记载的内容区分，有以下三种：

一、通志。包括多种内容（天文、地理、人物兼俱。即所谓纵不断线 横不缺项 应有尽有。全国性的一统志以及省、府、州、厅、县等志都属这一类。

二、专志。凡是专门或主要记述某一方面内容的志书属专志。如前举之山志、水志、寺庙、道观、书院、人物、艺文、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志》等均属专志类。

三、杂志。片断和零星记载某地域内政治、经济、人物、文化等情况，而无一定的系统和中心的志书属杂志。这一类志书最大的特点在于“杂”。如《平江记事》和《苏州杂志》等。

按纪年区分，可归纳为两类：

一是“通纪类”，内容从古通今，如宋乐史修《太平寰宇记》；二是“断代类”内容仅述某个朝代或某些年代，如宋王存修《元丰九域志》。还有各种“续编”也多属此类。

按文体区分，也可分为三种：

一是“编纂体”按一定体例分门别类汇编有关材料；二是“著述体”由编者按照一定内容自行撰述，不旁征博引其它材料。三是编纂和著述相结合的类型。当今已出版的一些新志书多采用这一类型。

按编写形式区分，还有纪传体、门目体、“三宝”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类书体等多种类型。

不论按哪种方法和形式区分方志种类，都必须讲求科学性。现今许多人往往把我国现存的八千多部（套）方志称为八千多种，是不确切的。数量是方志存在的总和，种类则是在现存方志总和的基础上按其表现形态的分并归属。方志的数量和方志的表现形态是不能同义而语的。

第三节 方志的源流及其发展

方志的源流

我国方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悠久的历史到底何为之源，可谓人人殊异，各执一端。据刘纬毅先生初步统计就有

十七种说法：

“商代甲骨文”说。邱富生和方致在《试论方志的起源、性质和作用》^①一文中说：“商代官吏对当时现状进行记录，这些现状的记录便是方志的源”。“殷人卜辞已包含有时、地、人三要素……是方志中大事记的直接渊源”。

《九丘》说。元代集贤殿大学士许有壬说：“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志之由来尚矣”^②。明代陈霖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称：“古者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聚此书。《九丘》亡而后岁时记于荆楚，风土述于周处，方輿载于祝氏，虞衡笔于石湖。与夫名贤有录，花石有谱，斯各具丘之一也。而外史之遗意，今志之大凡也”^③。

《山海经》说。近人王以忠认为：“《山海经》一书不仅为中国原始之地志，亦可谓中国最古地图之残迹矣”。^④史继忠亦认为“方志的渊源……源于《山海经》”^⑤。

《禹贡》说。元代至正《金陵新志》的修纂者张铉在其《修志本末》中指出：“古有九州有志尚矣。书存《禹贡》周纪《职方》春秋诸侯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清人邹汉员在《黄阳山水图记·叙》中也说：“《禹贡》一书为千古地志之祖”。

《周官》说。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最早提出这种说法。他在《河南志》序中说：“《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厉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

① 《安徽史志通讯》1982年第四期。

② 《元一统志·序》，《中国古方志考》第115页。

③ 正德《新市镇志·序》。

④ 转引自黄菁《方志渊源考辨》。

⑤ 史继忠：《方志浅谈》。

遗法也’^① 赞同此说者很多 清人任兆麟曾在《同里志·序》中指出：“地方曷昉乎？《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 小史掌邦国之志 诵训掌道方志 此即后世郡县志之权舆”。

“百国春秋”说。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曾在《湖北方志叙例》中断定：“百国春秋 实称方志。”梁启超就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他说：“最古之史 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国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②。

“土地之图”说。靳生禾认为：“我国始有方志之作 可溯之于先秦以图为主，以文为辅的土地之图”^③。

《国语》、《战国策》说。金毓蔽认为：“中国地方志”启于《国语》、《国策》以国别为史 继于《华阳国志》 大成于各省州县方志’^④。

《汉书》说。清人李世祐《襄陵县志·序》称：“班固《汉书》有地理、沟洫等志 为史中之体 与表、传分刻 此则郡县志之滥觞”。

《南阳风俗传》说。《隋书·经籍志》载：“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传 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 鲁、庐江有先贤之传。郡国之书 由是而作。”清人张学都在《太平县志·序》中说：“东汉以还，有南阳风俗、襄阳耆旧之纪，而志郡邑者始备”。

《越绝书》、《吴越春秋》说。清儒洪亮吉《重修澄城县志·

① 《司马温公集》卷六十六。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③ 靳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

④ 金毓蔽：《文心雕龙 史传篇疏证》，《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辑。

序》称：“一方之志 始于《越绝》 后有常璩《华阳国志》。”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亦说：“东汉会稽郡人赵晔著《吴越春秋》 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 两书专记本地典故 开方志之先例”。

“汉代图经”说。谭其骧先生在《地方史志不可偏废 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一文中指出：“地方志的渊源 确乎也可以追溯到汉朝。从《华阳国志·巴志》里可以看到 东汉桓帝时 巴郡太守但望的疏文里提到《巴郡图经》 可见在此以前已有图经。图经就是一方的地图加上说明，这就是方志的滥觞’^①。

《畿服经》说。清人谢启昆《广西通志·叙例》谓：“晋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实后世方志之祖”。

《华阳国志》说。清代方志学家刘光谟称：“方志之书 始于吾蜀。《华阳国志》其鼻祖也。”^② 梁启超亦赞同此说，称“晋常璩《华阳国志》 为方志之祖”。

六朝说。清儒顾千里《广陵通典·序》称：“郡邑志乘 滥觞晋宋。”现代方志学家王葆心也说：“盖宋元明以来之方志 源于六朝唐人之图经’^③。

唐宋说。现代山西学者郭象升，在其《山西各县志书凡例》中指出：“方志之书 肇于唐宋。”甚至还有人主张宋说。如蒋彤《武进阳湖新志·序》谓：“方志之作尚矣 肇之宋 侈于明 而极盛于本朝”。

多源说。黄苇先生在《方志渊源考辨》一文中写道：“方志源头较多 不仅有《周官》、《禹贡》和《山海经》 还有《九丘》之

① 谭其骧：《中国地方史志论丛》。
② 刘光谟：《章石斋文钞·县志分篇议》。
③ 王葆心：《方志学发微》。

书和古舆图等等。……方志并非起自一源，而是多源”。

除此以外，还有其它一些说法。上述种种说法，大都限于从有文字记载以后的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字记载或某一本书讲起，殊不知某一本书，作为一种文字载体，它同样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至于《周官》（又称《周官经》、《周礼》）记载的‘外史掌四方之志 小史掌邦国之志 诵训掌道方志。’于近现代意义上的方志是大不相同的。周代诵训所掌的方志是指关于王畿及王畿内外侯国的文字记载。外史所掌的“四方之志”是指关于王畿以外侯国的文字记载。而小史所掌的“邦国之志”，乃指关于周王国本身及王畿内侯国的文字记载^①。这种文字记载只能是方志的流，而不能认为是源。这里的“志”还没有作为近现代意义上的指方志这种记述性的文字载体使用，只作代词“记录”。在此之前，作为方志初级形态或作为方志主流的只称为图或图经等其它一些名称。所以《周官》所载和某一文字记载作为方志之源是不会令人信服的。

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诞生，往往不会突然出现，而是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同时也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趋于定型和完善。如果从方志是记事、状物、传人、述程这些方面去认识不错的话 那么探寻方志的渊源，则应从远古文化说起。人类社会出现之际，人们为着生存和生产斗争的需要，首先必须认识周围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上自天文气象，下至山川河流、动植、飞禽等等。都是人们所必须认识和了解的。特别是在传承经验、指导实践中，从简单的打绳结、刻划、图绘、口头传说入手 以帮助记忆和认识

^① 参见吕思勉《先秦史》谓：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盖指内诸侯言。外史掌四方之志，指外诸侯。

客观世界。这种原始的记事方式和表示社会各种形态的符号，应该说才是方志真正的源。

说方志源于远古社会原始的记事方式和表示社会各种形态的符号，而不是说那时的打绳结、刻划、图绘的任何标记就是方志。正象我们探求长江的源一样，必须寻找最长最远的注入长江的陆地水流。这条水流只能认为是长江的源，而它本身切不能认为是完整意义上的长江。方志也是如此。

如果按照完整意义上的方志认识，《周官》说也好，“百国春秋”说也好，还是先秦的“土地之图”说、《汉书》说“汉代图经”说等等，只能是方志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不同的流。

方志的流有综合性和单项性之分。中国方志初期的表现形式是图和图经，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图经。最早的图经是以图为主，以经为辅的。图表示地方的疆域、山川、关隘，经是对图的说明。随着频发的战争，土地的兼并与拓展，统治阶级需要掌握更多、更具体的人文地理情况，渐渐扩大了文字部分。相形之下，图的篇幅也就日渐缩小了。

现存的唐代《沙州图经》残卷，记载了沙州的水渠、濠泽、堰堤、咸卤、盐池、驿站、州学、县学、社稷坛、杂神祠异情、殿庙、古城、祥瑞、歌谣、名臣名将之所至等。它已经具有了很大的综合性。这一类图经是我国方志的主流。

主流之外还有一重要的支流，那就是以专记一地之人物、风俗、异物、轶闻的单项性的文字记述。如现存最早的《南阳风俗传》等。它虽为支流，但对我国方志的专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方志的初级形态

如前所述，中国方志源于远古时期的人们的打绳结、刻

划、图绘。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与其它著述同源异流，互为影响，而又各自独立发展。方志的萌芽时期，可能是记述单一或单项事物的。由于文字导源于刻划图绘，因此方志的表达形式是由图到图经，再向以文字记述为主，以图为辅过渡的；方志的体式则是由单一或单项记述向综合性记述发展的。这是由中国社会的发展、土地的吞并与拓展以及统治阶级的需要所决定的。

中国方志在秦以前，自由地、缓慢地生长着，只是到公元前 221 年，由秦国完成了攻灭六国的事业，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后，秦王朝推行郡县制度，在全国设置了三十六郡。为了了解各地情况，颁令全国，要求地方将輿地详情上报，便于朝廷掌握全国各地的情况，作为统治的参考。这样，促使中国方志有了长足的进展。

据《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记载 公元前 206 年刘邦率军初入咸阳的时候，诸将争抢金帛美女，唯萧何独有远见卓识 他不贪金爱财 不被美女所动 却“收秦丞相御史令图书藏之”因而“具知天下厄塞 户口多少 强弱之处 民所疾苦”。由此可以看出，各地上报给秦中央政府的輿地详情，既有图，又有文字记载 较之《周官》、《禹贡》、《山海经》记述地理 已有了较大发展。

西汉王朝建立后，鉴于秦置郡县太大，于是便分开析置，并且建立了诸侯王国。到西汉末年，总计全国有郡国一百零三个，县邑一千三百一十四个，道三十二个，侯国二百四十一个；另一方面，汉帝为了掌握全国经济、地理和地方向朝廷运输贡赋情况，命令各地方政府把记载当地物产、贡赋和交通等资料随同“计书”上送太史保存。这一时期 撰述的人很多 书

名也很多如《巴郡图经》、《三辅黄经》、《三秦记》、《上党国记》、《上党记》、《代都略记》、《三晋记》等。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汉）武帝时，计书上于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赣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史记·河渠书》和《汉书·地理志》资料的来源，多是利用郡国地志的。

班固的“地理志”记载的内容翔实明晰。范晔在《后汉书·郡国志序》里曾赞曰：“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自“地理志”问世之后，不但正史以其为规范，地方志也都仿此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对地方志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到了东汉时期，刘秀为了光耀乡里，下令撰修了《南阳风俗传》。因而仿效之风而起，各种“耆旧传”、“先贤传”、“风土记”、“风俗记”以及“异物志”、“水道记”、“山水记”等纷纷而出。可以说这一时期对于促进方志的发展是有所裨益的。这些著述之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方面甚广。到了魏晋六朝尤为繁多。这些“地记”的内容，一般都各有其侧重的方面而显出彼此的相异之外，因此又有郡书、地理书、都邑簿的称谓之别。郡书就是郡国之书，所记多为乡邦先贤、耆旧节士的事迹，用来表彰功德，以利风教并传之久远的，实际上就是一方的人物志。地理书所记，多为一方风土。诸如疆界区域、山川土地、道里户口、民情风俗，一一载录。都邑簿便是后来的城市志，多载城郭、宫阙、苑囿、观阁、仓廩、陵庙、坊市之类。这些著述的内容和形式，为后世地方志所取法，影响很深。可以

认定，此之前的各种注重地理也好，人物也好，还是都邑簿及其它为史所取的记述之作，是方志的初级形态。

方志的基本定型

在中国方志发展的历史上，有一部书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这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比较完整的以志命名的地方志。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人物。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一部重要的史籍。

常璩字道将 出生于蜀郡江原县 今四川崇庆县 的一个世家大族。曾在成汉李势时任散骑常侍，掌著作。这个职务给了他接触大量文献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方便，为完成《华阳国志》等著作创造了条件。

《华阳国志》最初也叫《华阳国记》成书于永和四年秋 公元 348 年 至永和十年 公元 354 年 之间。《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意即梁州东至华山之阳，西极黑水之滨。该志所记地区属《禹贡》九州之梁州 故取“华阳”以为名。《华阳国志》全书十二卷 附录一卷 包括巴、汉中、蜀、南中等十二志。记述远古到东晋穆永和三年（公元 347 年 期间巴蜀之事 约十一万字。其内容大体上是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梁、益、宁三州的历史、地理 而以地理为主 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叙述公孙、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纪 但记述稍详；十至十二卷记载三州自汉至东晋初年的“贤士列女”相当于“正史”中的列传。

从内容来说 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说 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 这两个三结合构成了《华阳国

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首创。

特别值得注意和称道的，是作者常璩对方志的价值和作用的论述。在《序志》中讲得很清楚，胜过了其它志书的作者。他说：“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在他看来，地方志可以在封建的思想道德教育、法禁的宣传影响和对古今事势的了解认识以及表彰功勋贤能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现有材料中所能见到的对方志的价值和作用最早的阐述。这“五善”，虽然宣扬的是封建时代地方志传述忠孝节义，维护纲常礼仪，巩固封建统治，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说教，但同时也说明了方志的部分价值和作用，对于后世方志的发展和兴盛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在中国方志学形成和发展历史上应占有相应的重要地位。

《华阳国志》之后，中历南北朝、隋、唐这种综合性的体裁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绝大多数的方志著作仍沿袭东汉魏晋的余绪——史、地、人分家，极少综合之作。明清以来的方志，虽浩如烟海，但象《华阳国志》那样规模宏大、内容广博、体例简括、取材精审的并不为多。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一书所录，宋元以前的古方志多达二千一百七十五部，现存者已不到七十部。其中有的真伪杂糅，有的残缺不全，有的内容狭窄，其价值远逊于《华阳国志》。因此，《华阳国志》可说是我国隋以前古方志中硕果仅存者，是我国方志基本定型的一个显著里程碑。

方志的鼎盛时期及方志学的产生

《华阳国志》后，在南北朝、隋、唐时期，这种综合性的方志体裁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极少综合之作。这里有传统的影响，材料的限制（自九品中正制废，对乡里的人物、历史不再象

过去那样重视)，也与作者的学识有关。只是到了宋代，方志的编纂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此时，不少著述取材更为广泛，分类更为详密，从而奠定明清以来一般方志的体例。但究其内容，基本上还是历史、地理、人物三个方面，终未跳出《华阳国志》体例之窠臼。

两宋时期，地方志盛兴。不仅官修方志，私家著述也相当发达，成就十分显著。这与当时统治者的倡导和外族的频繁进击是分不开的。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后，曾三令五申，要各个州郡编造图经，纂修志书。据宋史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后不久就下令规定：“凡土地所分，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图，州县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后来，又命令大臣卢多逊等人重修天下图经。真宗在位时，也下诏由李宗谔等负责，纂修了《详符州县图经》一千五百六十六卷。徽宗时，朝廷还设置了“九域图志局”，开了后世官方修志的先河。南宋时期，虽然偏安于一方，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军事上已为金兵所迫，但在纂修地方志方面，却做出了成绩。由于外族进击，许多有识之士借纂修方志来表达对邦国之爱，纷纷私家修志，产生了大量的私人著述。

两宋时期的上乘志书很多。如李宗谔《详符州县图经》、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和欧阳忞的《舆地广记》、祝穆的《方輿胜览》、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以及宋敏求的《长安志》、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潜说友的《临安志》、范成大的《吴郡志》等等，都是著称于世、很有影响的志书。正如张国淦在《中国古方志考·叙例》中指出的：“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輿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